



父亲的“配车”

阎晓明

“配车”，是指工作单位配备给工作人员的专用车。读小学时，有同学听说我父亲居然享有配车，便开了开来，纷纷打听是是小轿车还是小吉普，是怎样的品牌与样式，由此想推断配车主人的级别待遇，进而让我带着他们一睹配车的真容与风采。然而，令小伙伴们失望的是，父亲的配车竟然只是一辆看上去半新不旧、历经沧桑的自行车。当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行车，也算是稀缺资源了，所以，无论别人怎么不屑，父亲还是蛮珍重他那辆配车的。

我自记事起便知父亲有这样一辆自行车。每当听到链条磕碰挡泥板那哗啦哗啦的声音自远而近，就如父亲已到窗前。随着脚踏支架、手按车锁咔嚓两声响，他便会推门而进。父亲没有正常的上下班时间，也经常不回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父亲的任务是“火调”，要在处理火警后最短时间内调查出火灾的真正原因，记得他曾多次给我讲过南开大学亢铁儒教授如何帮他给一起火灾“破案”的传奇故事，言语中充满了对科学家的敬佩和对科学知识的崇尚。后来，以此为线索，经采访亢教授之子亢大器，我撰写发表了文章《有点神的亢铁儒》。1981年，我还曾以父亲这个老“火调员”为原型，创作发表过短篇小说《火魂》。

在我读小学之前，尽管父亲难得回家陪我玩，但有几次爷儿俩躺在床上，他为我唱歌的情景至今还经常浮现于眼前。他唱的净是一些奇奇怪怪直到现在都没有在外面听过的歌，如“老黄牛啊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给它戴上一朵大红花”，如“军号在吹，枪炮在响，百战百胜野战军，奔赴前线歼灭敌人。一个个生龙活虎一、二、一，一个个奋勇杀敌一、二、三、四！”他还喜欢写毛笔字，每次给住在北京的爷爷写信都要将毛笔握得笔直，爷爷的来信也是端端正正的小楷字体。父亲为家里订了一份《新晚报》，有些杂志可能是随手买的，如《新观察》，里面有

张光宇画的孙悟空，记得还有篇文章叫《祁连山下》，我当时不认得“祁”字，问他，他说念“起”，我15岁到祁连山下屯垦戍边时发现大家都读作“奇”，还曾写信告诉过他。

尽管配车只是一辆自行车，父亲却视为珍宝，从不驮我，他说：“这是单位让我上下班和执行任务骑的！”每逢周日加班，他都是自己骑车先走，让我随后背着书包去单位找他，边陪他加班边写作业。大概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嘱我晚上去单位找他，他带我进了二楼一个黑黢黢的大房间，里面的人一排排坐着，正在看一个很小的屏幕，播放的内容好像是苏联领导人在中国参加国庆十周年的相关活动，父亲悄悄告诉我：“这是电视。”刚看了一会儿，房间突如其来地发出巨大声响，人们瞬间站了起来，有的从椅子背上一跃而过，有的顺着墙角的铁管直接滑落至一楼，刹那间，房间里的人大都迅速冲出门去，空荡荡的大黑屋里只留下我和父亲及另一位叔叔。父亲当时镇定自若，仅以为为常地对我说：“出火警。咱们回家吧，我一会儿也得去现场。”我问他那些叔叔怎么救火，他说找机会带我看看。那晚，尽管夜已黑透，父亲还是不驮我，他推着自行车，我们一起走回了家。

不久，父亲真的让我看了一次消防员们的救火本领展示，不是火警现场，而是消防比武大赛。他让我自己到新华路体育场去观看，然后自行回家，因为他要负责各个比武项目的拍照存档，顾不上管我。其实顾得上我也不会用他的车驮我往返的。比武场面很是火爆，各项目都是掐秒表计时的——携成卷消防水管跑过独木桥，翻越障碍墙、将水管奋力用开迅速连接，携消防器材钻跃火圈后用泡沫喷射烈焰熊熊的大油箱，用湿棉被遮盖扑灭着火的油锅……

次日，父亲又骑着他的配车回来了，一进屋就兴冲冲地取出一张形状怪异的照片：“看，我分上中下

三段拍的云梯，再把洗出来的三张照片拼接在一起。”由于在现场看过比武大赛，我对父亲这种拼接技巧印象挺深，后来在军垦农场当新闻干事时，也用这种拼接法拍过连绵的祁连山，父亲那云梯是纵向衔接，我是横着拼的。

读小学时，我们大杂院的一些孩子都已开始用家里的自行车学骑车了。因为个子小腿又短，坐到座上脚够不着脚踏子，他们便用左脚站在左蹬子上，将右脚穿过大梁去掏着踏上右蹬子，跨在自行车上，先将车轮蹬转半圈，再倒回脚踏子，接着往前骑。尽管他们身子并没有坐到车座上，而是吊在左侧晃悠悠、歪歪斜斜地骑，也足以令我眼热得厉害，便忍不住也想借父亲的车子一学。我以为学骑车总归是为了增长一个男孩的本领，父亲应该会支持，没想到他回绝得十分干脆：“这是公车，不能私用。等咱家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再学吧！”我便一直不会骑车，直到参加工作十年后从玉门镇调至兰州，单位也给我配了一辆自行车后才总算学会。

不过，父亲的配车还是为我用了一次。读初二时，家住河西区桃园村街的一位同学说，他们街道正在招收赴西北参加军垦部队的青年，我和其他三个同学便瞒着家里报了名。得到批准后，按要求须将行李集中送到桃园村。父母得知此消息非常突然，但也表示了支持。父亲骑车出去为我驮回一个崭新的柳条箱，匆匆装了少许衣物和一条褥子，便又捆在后座上。他推着，我跟着，走了40多分钟，那是我同父亲一起步行时间最长的一次。因瞒了父母，我自知理亏，一路无语。父亲对我的抉择略显遗憾：“不是不支持你参加边疆建设，只是觉得你学习这么好，总盼你能上一个大学。我和你妈念书都太少。我只上过两年私塾，你妈通过夜校才读到初中。”我愈发沉默，眼睛却湿润了。

军垦农场批准我第二次探亲时，全家已下放到南郊大韩庄。我按父亲信中给出的路线图，从火车站辗转坐公交车到距大韩庄最近的二道桥汽车站，父亲早已扶着一辆自行车站在那里等我。“坐上来！”父亲拍了拍后座，“下放农村后，咱家买了自己的车，可以驮你啦！”由于我当时还不会骑车，只好任由父亲驮我。年已上百的父亲，驮着我这个身高已经一米八的儿子，在乡间坑坑洼洼的简易泥土路上骑行，竭力装作毫不吃力的样子。坐在父亲身后，近距离望着他已花白的短发，和那由于吃力蹬车而一耸一耸的肩膀，我因不会骑车驮他而惭愧至极、无地自容。

那是父亲第一次驮我。儿时最该被父亲驮的日子里，他没有驮过我；等我长为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后，他却驮了我。这一切全是因了他那辆对我而言被禁用的配车……

天津的五大道如今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必徜徉、流连忘返之地。对于冯骥才先生来说，五大道则连接了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成为其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我二十五岁之前的人生是完整地在五大大道上度过的，对于曾经的我，五大道像一条河。我的生命像一条清流”——这是土生土长于天津的冯骥才对五大道之于自身生命的描述，也是《清流：五大道生活（1942—1966）》这本自述其早期生活经历的书得以命名的由来。

用清流这个词来形容五大道生活，不难想见，冯骥才早年的时光如同“一条纯净透明的蓝色的清流”般透彻明亮——童年时期近乎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记录着这位未来的文化大家最初的生命历程。在冯骥才的记忆中，自己的童年是一个由阳光、笑声和梦想组成的美妙无穷的幸福混合体。虽然他在幼年 and 童年时期，听闻过解放战争中的飞机轰隆声，感受过炮弹震地的颤动，但孩子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未察觉到其中的危险，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磕碰。尤其是作为家中迟到的长子，幼年时的冯骥才是其富裕家庭的宠儿，这让他有着充裕和快乐无忧的孩提时光，使其天性不受压抑。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冯骥才慢慢地培养起对绘画和阅读的兴趣。从最初听长辈讲故事，到上小学后对小人书的痴迷，再到跟随严六符和惠孝同二位先生学习绘画，他的艺术天赋也逐渐显现出来。冯骥才说少年时代自己对小人书的痴迷近乎疯狂，最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聊斋故事》，从前听姥姥讲的故事，在小人书里得以直观呈现，不仅带给他无边的知识和想象，而且通过小人书这个桥梁登上了阅读和文学的彼岸；除此之外，还引发了他对书中插图的模仿，并很快通过专业的学习踏上了绘画之路，也直接影响了 他后来从事的仿古画和工艺美术的生计。

童年的经历对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对于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这并非某种后见之明，而是生命中悄然注定的事情。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冯骥才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野蛮生长的时代，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从事什么职业，但他凭着自己的本心去接近和探索热爱的东西，哪怕绕了远路，也不曾放弃；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只要我们真正热爱艺术，不管走了多少的弯路，最终哪一样都不会失去，都会汇集到我们身上，化为

深厚的积淀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正如冯骥才自少年时代学习宋代山水画，本想考美术学院成为画家，后因故未上美院，峰回路转，获意外机会在书画社谋取生计。然而，正是在书画社谋生的岁月，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如此真挚，国画也成为他毕生追求的艺术形式之一。冯骥才对此感慨道：“我还总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决定着 我，由于我们无法解脱，便推给了命运。”

这种命运的推动不仅体现在绘画上，也包括文学。尽管冯骥才的孩童时代充满欢声笑语，但因种种原因，终究要沉入社会的底层经受历练。进入新时期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之时，冯骥才写过一篇名为《命运 的驱使》的文章，认为自己从绘画转入文学的道路同样来自命运的驱使，也是沉潜生活使然，更指出“这不单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祖国、同时代人共同的命运”。如果说，绘画更多是个体心灵的再现和灵感的勃发，那么文学则是作家对社会责任感的表达，体现作家为民族国家记录历史的良心和使命，而从这时才正式开启了冯骥才的文学时期。

有意思的是，冯骥才将文学、绘画、教育和文化遗产保护称作他毕生从事的“四驾马车”，而从绘画到文学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轨迹，其实在“清流”这个时段已经初见端倪。不必说自幼习画，甚至在青年时期临摹《清明上河图》时，都唤起了他对市井烟火和风俗生活的好奇与热爱，间接影响了 他于新时期聚焦天津历史民俗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以及后来的《俗世奇人》系列作品。而早在1960年代初，基于天津砖雕遗存调查完成的《天津砖刻艺术》一书，更成为冯骥才日后发动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起点，当时使用的多种调查方法也被他直接运用在1990年代的老

城和老街保护上，其传承口述史方法至今仍运用在非非遗保护抢救研究之中。

回到本书的题目。五大道原是天津城南的一片沼泽地，20世纪后成为英租界的一个居住区，得以发展。20世纪20年代，冯骥才的祖父一家和外祖父一家，分别从宁波和济南出发迁居至此，成为这座城市的“新移民”，体现了近代天津华洋并存、五方杂处的特点。此历史时期天津出现的这个崭新的城市机遇，成就了冯骥才父母的姻缘。冯骥才不仅在五大大道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还收获了珍贵的爱情，五大道寄托了他太多的家族和人生记忆，如同发酵数十年的美酒，让年逾八旬的冯骥才再度回味起人生的甘苦，如清流般涌动历久弥香，这里对于他“依然有家的气息、家的气息是人间最深切的气息”。



杨毅

从清流中涌动出的人生之路

宝黛爱情从萌芽走向破灭，若从现实生活中找依据，大概是不难理解的；在可能影响他们情感结局的人之中，贾母作为大家长，必是数得上的一个。读者很明显能看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中贾母态度断崖式的变化，那么，在前八十回中，贾母对宝黛婚姻的态度，就没有丝毫可品咂之处吗？

第三十五回中，贾母当着王夫人、薛姨妈、宝玉、宝钗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提起姊妹，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有学者认为这是贾母明确表示倾向于宝钗。但又 有学者针锋相对，认为“我们家四个女孩儿”中其实包括了黛玉，这恰恰说明贾母对黛玉更亲，视黛玉为自家人，而宝钗为外人，在婚姻上还是倾向于黛玉。

书中的确多处体现出贾母更疼爱黛玉，但这并不能构成贾母一定要选黛玉做孙媳妇的理由。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宝钗是亲家亲戚，怎么会亲过黛玉？而谁该做孙媳妇，不能以亲属关系的亲疏为依据。如果黛玉真的被贾母划入“我们家女孩儿”的范围之内，那反倒坏事儿了，因为媳妇肯定不能选自

己家的，要选别人家的。也就是说，黛玉一旦在心理和情感上失去了“客”的位置，她就失去了成为宝玉夫人的机会，她作为家人，可以被关爱、包容，却不再有被选为媳妇的可能性。

黛玉转“客”为“主”，其实早有迹象。她初入贾府时，王熙凤曾有一段精妙的表演，先说“不曾迎接远客”，又说“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说她是“客”，完全符合事实，绝无贬低之意，说她像“嫡亲孙女”，多半是阿谀奉承，却间接证明了她还有与宝玉中表通婚的可能性。但到了第二十二回写贾母给宝钗过生日，家宴酒席上“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此处，脂砚斋批语说：“将黛玉亦算为自己人，奇甚！”何以是“奇”？奇就奇在黛玉的转“客”为“主”，貌似地位提升，实际逐渐同化进“三春”之列，也就逐渐排除在媳妇都是“外姓人”的范围之外了。

贾母也许正是在这种对黛玉越来越亲近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降低了黛玉候选孙媳妇的成功指数。黛玉的缺点很明显，贾母可以包容一个这样的外孙女，却不会包容一个这样的孙媳妇。回头再看第三十五回贾母的言辞，我们还会天真地认为她倾向于黛玉吗？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贾母当着王夫人、薛姨妈的面说的客套话。但请注意她说这话之前，宝玉先说了一句“若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而他说这话之后，叙述者又说了一句“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赞林黛玉的，不想反赞起宝钗来，倒也意出望外”，纵使宝玉再痴呆，他的意外，也说明他多少听出了贾母的弦外之音吧？

到了第五十七回紫鹃鸟葬地试探宝玉，竟勾出宝玉的痴病，这可是一起很大的波澜。宝玉虽很快化险为夷，但若站在贾母、王夫人的角度来感受，她们会轻易忘却，略无挂怀吗？有人说这是紫鹃惹祸，与黛玉无关，但世故老练的两代夫人，会不迁怒于紫鹃的主人吗？

当知道事件根由后，“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顽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最是个伶俐乖巧的，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作什么？’”有的读者觉得风波已平，慈祥的贾母此时语气并不激烈，甚至说是轻得不能再轻的话。试问，若是如此，还需要薛姨妈紧跟着说了一段劝慰的话吗？宝玉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还想要贾母端着大家贵

妇的架子，和声和气吗？

况且，风波实际未平，宝玉突然又受刺激，发作起来，贾母遂说出一句“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罢”，这个“死绝了”固然是旧时人常说的词汇，但总归是难听的话，在这里估计也不乏咬牙切齿的愤怒了。

更奇妙的是整个过程王夫人一言未发，凭她的身份和事件的紧急程度，她是没有必要有任何顾虑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贾母已将情绪表达达到顶点，她不需现场发作，只需在心里记下黛玉一笔账了。

如果这样来看，贾母不得不因生活的琐事及重大的波澜对黛玉产生不满，但她仍慈爱包容。正如上文所说，她将黛玉揽入怀抱，也就使宝黛的婚姻距离越拉越远了。



绿水青山多锦绣（中国画）

喻建十

一册签名本 揭秘一段抗战往事

春晖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陈香梅女士诞辰100周年。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华人华侨领袖，是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卡特等八位美国总统的顾问，为促进中美关系友好发展作出过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她回国拜见邓小平时，谈到老兵探亲问题，几年后，海峡两岸开放探亲，她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了两岸的交流。现居广西南宁的湖北人李仕东珍藏着陈香梅赠送给他的著作签名本，其中一本《往事知多少》上有陈的签名，一段尘封80年的往事由此揭秘。

1937年，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克萊尔·李·陈纳德应邀来华担任中国空军顾问，1940年10月至1941年7月，他从美国招募了一批飞行员、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在中国组建了一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因画着鲨鱼（中国西南后方居民误认成老虎）头的战斗机机头和绘有插翅飞虎的队徽，故称“飞虎队”。陈纳德在其回忆录《战士之路》中曾记述：他们在云南上空痛击敌机之后，又沿江扫射长江流域的日军，整日不停地战斗。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后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成为该队下辖的第23战斗机大队，后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由于第14航空队对湖北的空中支援，日军开始有组织地撤退。鲨鱼头战斗机和“肥胖”的解放者飞机在空中盘旋，中国军队士气高涨。

1945年1月14日，为打击盘踞在武汉的日军，号称“空中堡垒”的B-29型轰炸机自凉山飞往武汉，其中一架在湖北孝感野猪湖方向飞到祝家湾火车站上空时忽然折回，在空中转了几个身，冒着白烟直往下坠，在祝家湾、黄谷湾附近的沈家塘前落地，强大的惯性使飞机连续穿越多块稻田，最后在一梯形稻田里停下。一高鼻子、白皮肤，头戴船形帽，军衣左袖有条条旗



标记的飞行员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一手提枪，一手提包，沿着田埂跑起来，慌不择路的他跑到张家榨屋一地主家的榨房里面。

地主儿子读过书，识英文，交谈后得知这名飞行员名叫派克斯登，隶属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地主怕惹来大祸不敢收留，派克斯登又跑到长坟坡一壕沟里躲藏起来。长坟坡杂草丛生，只有几座孤零零的坟，甚是荒凉。徐家湾村民李福林、李海云看到派克斯登躲在深沟里，连忙跳下去，李福林将自己穿的长袍脱下来，比画着让派克斯登换上，又打手势说是来救他的，派克斯登这才脱下飞行服，换上长袍。两人将他带回湾里，嘱咐湾里人不要声张，以免台湾遭殃。当时，平汉线（现京广铁路北中段）祝家湾火车站、三汉埠均驻扎着日军，冈家集、上新集驻扎着伪军，得知飞机坠落，他们倾巢出动，企图俘获飞行员。

李福林、李海云见情况危急，湾里藏身绝非长久之计，就和村民余伯勋、李协清商量，将派克斯登送回飞虎队才安全，但一路上日伪军岗哨林立、关卡重重，如何过岗哨关卡？最后他们决定让派克斯登装扮成一个道士，动员家人马上赶制道袍、布鞋、道士用具，还刻制了一个标着“哑巴”字样的铜牌，以免派克斯登语言上露出破绽。出发时，派克斯登

胸前挂铜牌，头戴一顶当地叫“狗钻洞”的帽子，还戴上一副眼镜，尽量走荒野小路。没有经过长途跋涉的派克斯登后来完全走不动，鞋子磨破了，双脚鲜血直流，只好由四个人抬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住宿时，派克斯登伪装成传染病重病人，以免与外界接触引起怀疑。从杨店经肖家湾子时桥、杨家棚子、坡家畈、柳林店，历经千辛万苦，于1月20日抵达樊城周家湾国民党45军军部。临别前，派克斯登将自己的证件、证章，编号送给李福林作纪念。国民党45军派人将四人送出辖区。

离开樊城返程，四人盘缠用尽，沿途乞讨回乡，不敢进湾回家，躲在一个湾子里，暗地里请人带信回湾里。家里来人见面得知，他们走后，驻扎在祝家湾火车站的日军卸走了飞机的螺旋桨，驻扎在冈家集的伪军在几个湾拉人，抬走了飞机残骸，有十几个村民累得吐血。他们还不罢休，到处搜查，并威逼村民交出派克斯登。湾里有人被带到洪家田灌盐水、上竹签子，严刑拷打，李福林等四人的家被查封，李福林的父亲李大顺、李海云的妻子汪氏被吊在树上，遭到毒打，遍体鳞伤，血流满地，气息奄奄。日军还四处张贴告示，捉拿李福林等四人。凶残的日军见问不出什么，就将徐家湾、黄谷湾洗劫一空。李福林等四人连湾都

没有进，只得外逃求生。李协清逃到武汉，另外三人四处漂泊，后在凉山巧遇派克斯登的战友莫尔云，得知派克斯登已回国养伤，临走还念念不忘几位救命恩人。莫尔云逐级上报营救过派克斯登的李福林等三人来凉山后，中印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在重庆接见并宴请了他们，颁发了嘉奖令并合影。之后，三人在重庆休养了一段时间。

1948年初，李福林等人因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新村5号别墅（时人称“陈公馆”）受到“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接见，在场翻译即刚与其结婚的陈香梅，她当时是一名记者。陈纳德说：“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们干得很好，我感谢你们。”他安排李福林等人在上海一飞机场干活，因离家太远，他们后来转到离家较近的武汉胭脂路南湖飞机场看守仓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回到徐家湾，重新以种田为业。

1995年8月，时任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应第六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组委会邀请，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武汉举行的开幕式。从媒体上看到陈香梅来汉的消息，李福林之孙李仕东激动不已，“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要去找她，以完成祖父未了的遗愿”。他带着相关资料，通过武汉统战部找到下榻于东湖宾馆的陈香梅。得知李仕东的身份后，陈香梅热情接待，与他合影留念，并赠送一套她新近在武汉出版的著作，在其中一本《往事知多少》上签名。她回忆道：“那时我们（指与陈纳德——笔者注）刚结婚，在上海陈公馆见面的事，印象不很深刻。武汉有过三次轰炸，飞虎队都参了战，我代表飞虎队感谢你们的祖辈。”陈香梅还索要了李福林等人营救派克斯登的材料。2015年9月，陈香梅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前一天接受习近平主席

颁发的抗战纪念章。

80年过去了，而今，陈纳德、陈香梅均已故去，合葬于美国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他们的墓碑是这座公墓里唯一的中文墓碑。

2025年7月26日至30日，美国飞虎队夏令营代表团在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和飞虎队老兵后代安娜·安东妮娅·李的带领下访问湖北，旨在传承飞虎精神，缅怀抗战英雄。202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尔、麦克马伦，希望飞虎队精神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接到复信以来，飞虎队老兵后人首次来到湖北。7月27日，在代表团人住的武汉一家酒店，李海云之子李国章与代表团见面，并与杰夫、安娜紧紧握手、拥抱。杰夫说：“当年营救过飞虎队飞行员的中国人民朋友，很多已经离世了。今天见到你，我感到非常荣幸。”安娜说：“我的父亲也是一名飞行员，他总说，中国人是他认识的人里面最伟大的。感谢您父亲的义举，他们不仅救了一名飞虎队飞行员，也救了所有飞行员。”李国章现场展示了父亲李海云亲笔书写的营救派克斯登的经过、父母的合影及其他相关资料。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杰夫、格林带领几位飞虎队老兵后人再次来到中国，受邀参加了阅兵观礼。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这段故事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这段历史佳话还在流传和续写。

满庭芳

第五四三期